
日本国民心理嬗变的原理与趋向

李 文*

内容提要：日本人能够顺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原有的态度与看法。日本与其他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通常能直接导致日本国民心理的变化。日本国民心理富于变化，与日本民族特有的哲学传统和审美习惯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日本民族主体意识淡薄，轻视永恒不变的原理和法则，推崇和赞美“无常”。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带来国际关系格局的新调整，使日本国民心理正孕育一场新的历史性巨变。

关键词：国民心理 对华心态 原理 趋向

关于日本国民心理富于变化的一面，前人研究已多有涉及。本文的贡献在于：将散在于已有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加以系统概括；揭示日本民族性的这一特征与其哲学、美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从已厘清的脉络出发，预见未来一个时期日本国民心理的嬗变趋势。

一 日本国民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

能否顺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原有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技巧的重要表现。任何民族的心理状态，都有延续性与变异性两个方面，但日本民族具有一些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性。

（一）面对形势的变化，日本国民心理能够迅速而简捷地发生调整和改变，无须循序渐进，也不必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明治维新这一日本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就得以完成。300个藩国的封建诸侯，争先恐后地把土地和政权上缴给天皇，几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即使是出任过历代幕府内阁首领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的井伊藩，一见幕府旗色变换，马上变成“勤皇派”，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明治政府发出“求知识于世界”的号召后，国民纷纷响应，在一夜之间举国上下都开始崇尚西方的风俗习惯，对原有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留恋。

二战结束后，在对待战败的态度上，充分表现出日本民族为获得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不惜以高昂的角色错位为代价，不必历经沉重的心理磨难和痛苦。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播放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讲话时，被软禁在长野县轻井泽町的白人罗伯特·奇兰目睹了当时的情景：留在日本本土内的 7500 万日本人以前的态度是宁死也不投降的，而现在却跟着天皇一起向右转。从天皇发表广播讲话的第二天起，他们便开始呆笑地向奇兰和其他白人打招呼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进行得很平静，没有遭到日本人的武力抵抗。他惊叹：夺去了日本 300 万人的生命的这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① 袖井林二郎对占领下的日本人写给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的多达 50 多万封信函进行了分析，生动地刻画出了在战败这一极限状态下的日本人的心态。在这众多的信件中，大部分是问安、激励、感谢甚至“臣服”的表示。许多写信人称麦克阿瑟为父亲和神，恳求“把日本当成美国的属国吧”。数百女性对“麦克阿瑟这个至高无上的男性”写道“请让我生您的孩子。”^②

（二）日本国民心理能够根据需要作出颠覆性的调整，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排斥细微的和点滴的变化

二战后期，美国动员了一批英美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进入情报分析和心理战争的研究领域。“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们的工作已经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的性格是钟摆式的，可以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而能够由狂热的军国主义，转向某种真正的民主主义。”^③ 例如，战时日本人曾将同盟国骂做“鬼畜美英”，但战争结束后，“敌人”转眼间成为“恩人”。“战败时，日本人坚持抗

① 参见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1 页。

② 袖井林二郎『拝啓マッカーサー元帥様—占領下の日本人の手紙—』（中公文庫）、大月書店、1985 年。

③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91～192 页。

争到底的疯狂信念立刻消失，转而对原来的敌国，也就是美国文化产生绝对的崇拜与赞叹，这种崇拜与赞叹几乎支配了全日本。”^①

（三）日本人对“风向”十分敏感，“与时俱进”的通常是绝大多数国民，而不限于部分国民

中村雄二郎说“日本社会中容易形成一种情绪性的共同性，在有些问题上能够非常有效率地给社会整体定向。”^②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例。明治前期，在自由思潮的影响下，“举国竞相钟爱自由二字，使其不仅仅为政治社会独家所使用。浴池有自由浴、自由温泉，糖店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更有自由讲、自由舞、自由帽等，不胜枚举。民心所向，可见一斑。”^③二战结束后，日本人一度对“新”态度也是如此：一时间几乎各种报纸杂志都被有关“新”的内容所充斥，如新时代、新文化、新民主、新教育、新地理、新历史、新希望、新劳动、新生活、新电影、新会社员工、新学校、新诗、新体育运动、新路、新女性、新世界、新生民主佛教、新文学、新俳句、新式婚姻、新自治、新世纪、新自由、新自由人、新社会、新科学、新农民、新农村、新青年、新警察、新式家族、新式美容，甚至新的幸福之星，等等。^④

“日本人看到邻居家开始播种麦子，自己也会赶紧播种。”这样的作为，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日本民族的“集团性心理”。正如社会学家间庭充幸指出的那样：日本是非常强调同质者趋同的社会，每个人都害怕被视为异端。异端的下场就是孤立，什么事都没办法做。^⑤

日本民族性的这一突出特征，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明治时期，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指出：“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⑥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强调：“日本人从一种行为

① 南博：《日本人论》，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

② 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恶与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③ 板垣退助監修『自由党史』中卷、岩波書店、1957～1958年、206頁。

④ 参见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50页。

⑤ 参见南博：《日本人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⑥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

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日本人的行为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路’。‘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①，二战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也认为：日本人“对变化着的外界形势一直反应极为敏锐。……变化之迅速使人难以进行深刻的分析。头十年形成的牢固概念，过了十年，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再过十年，几乎就荡然无存了”^②。

二 以实力为衡量尺度

日本人看法和态度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实力对比的变化通常是理解日本国民心理变化奥秘的关键。实力对比的结果通常就是权力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形成，而日本民族的一大特征就是普遍存在强烈的“权力至上”倾向。福泽谕吉就曾指出：“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③

日本人这一民族特性的形成，与武士阶级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有关。与中国士大夫阶层重视“名节”、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同，“作为效率主义的军事性集团一员的日本人，在‘名’和‘实’面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实’。这并非不好。是胜还是败，走在生死线上的集团，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下去”^④。

古代中国士大夫在官僚等级制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场上的表现，“观念的能力”主导一切，而日本武士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由武力和军功来确立的。因此，在日本貌似极僵化、缺乏活力的等级身份制下，掩藏了“现实的能力”主导一切的大势。因此，“日本表面上看来是缺乏平等的身份制，但由于身份是以对现实的能力所确定的。如身份

①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6、118页。

② 赖肖尔、詹森：《当今日本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22~123页。

③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2页。

④ 陈舜臣：《日本人与中国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同现实的能力明显地不相符合，身份的内容和主体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具体言之，日本对现实的变化相当敏感，这正是变革的起因”^①。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日本人同样倾向于将“实力”作为区分敌友和亲疏的标准。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一直是文明与文化的源泉。在接触了西方文明后，日本马上将西方文明作为衡量标准，转而尊敬西洋，蔑视中国。^② 竹内实概括说“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尊敬、憧憬，甚至有时觉得可怕的对象。可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对日本的这种优越地位，被西洋代替了。日本开始尊敬、憧憬和害怕起西洋来。”^③ 甲午战争后，日本人蔑视中国的思想的影响在全国范围迅速扩大。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出发点就是对“支那”和“支那人”的完全蔑视。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近卫内阁的“支那不堪一击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面对难以挽回的败局，日本人萌生了对美国人的敬畏之心。津田道夫描述道，从败色渐浓的时候起，日本人对物质和科学力量的恐惧感的胚胎即已形成。1944年8月以后，许多日本人都公然发出了如“美国有雷达，所以日本的战争打得很苦”等哀叹，“对英、美是无可奈何”的感觉成为日本人共同的情绪；日本是败在伴随着美国的强大的科学和物质力量的军事力量手里，则成为战败之初日本人最普遍的认识。时任昭和天皇的侍从入江相政在1945年8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从早上起，美国飞机就在极低的空中盘旋，嘈杂，但没有办法。……一个手艺人样的男子感叹：‘啊，烦死了，你们厉害，我们知道了。’这实在是我们的心情的写照。”入江还说了下面的话“但B29实在是美丽的飞机。……不太有恨的感觉，到底优秀的科学力让人心旷神怡。”总之，“负于美国让人痛惜，但在

① 正田健一郎編『日本における近代社会の形成』、三嶺書房、1979年、15頁。

② 福泽谕吉说“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他还说，由面对中国文明的汉学转向面对西洋文明的洋学，如同“一生经历了两世，也好像一个人具有了两个身体”。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1、3页。

③ 竹内实：《日中关系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352页。

那样的物质力量和科学力量面前，是无可奈何的，这成了共同的感觉”。^①

二战后，日本人崇尚实力的心理有增无减。虽然同样是战胜国，日本人对美国的崇拜与对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的歧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坚信，打败日本的是先进、强大的美国，而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但日本人始终不愿意向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就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和道歉，究其原因，也在于这种欺软怕硬的心理作祟。正如杜浩所指出的那样“因经济成功而导致日本不断增强的自信和民族主义……因此对于中国坚持提出过去的问题感到非常失望和恼怒。……这一切使得日本很难向以前的受害者表示一种可以接受的道歉。”^②

三 “无我”与“无常”

如追溯思想根源，日本国民心理富于变化的特征，与这个民族“无我”和“无常”的哲学传统和审美习惯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

(一) 与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在主体意识或自主性方面不够成熟

日本人缺乏“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精神，也不善于内在心灵的修为。在日本文化中，缺少中国哲学所提倡的良知、良能以及康德所说的“道德律”。

日本人的自然观以“无我”为基本取向，倡导忍从与融合，认为自然才是本来的真实与美，排斥人的作为。故此，在日本哲学思想中不存在人与自然对立，也没有“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观念。虽然当代日本人接受了以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之对立为基础认识的西方自然科学，但传统的自然观仍根深蒂固。日本一研究所曾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将对自然的态度分为顺从、利用、征服三类，调查结果是主张

^① 参见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② 杜浩：《冷战中中日安全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顺从”的占33%，“利用”占40%，而“征服”只占17%。^①

“无我”观同样贯穿于日本的美学传统之中。以东山魁夷为例。他的绘画，被人们认为是在最大限度上表达了日本传统美学结构“幽玄”的一面，其审美情趣是追求抽象的玄思、虚、空、否定之肯定。东山魁夷强调美存在于“无我”之中，他把万物都看成是“虚妄”的。所以，他一旦面对大自然，自己就忘却一切，保持纯粹的自我，甚至舍弃自我。他说“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然的直接把握。”他还说“天地万物的存在，是同生存在无常中的宿命紧密相连的，所以只有舍弃自我，才能把握真实。缘此，画家观景写生，首先净化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达到无我之境，就可谓‘心中万般有’了，这样才能发现自我之外的自然之真实，创造出美来。”^②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日本人尽量避免培养和张扬自我和个性，优先予以考虑的是团体的目标和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幸福和人格的完善。日本文化中不认为个人的尊严和成就首先依靠个人的才智、奋斗和机遇，而是认为须经由团体而获得。这导致日本人担当精神和责任感的缺乏。加藤周一指出“在15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几近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谁也没有责任。”^③

日本人对于人际关系都很敏感，不善于维护个人的权利，偏向采取以他人为重的态度，不愿妥协、特立独行的日本人凤毛麟角。在强调个性的美国和西方社会，讲求“罪的文化”，订立绝对的道德基准，如果违反就会被定罪，同时，罪也可以通过忏悔或赎罪来减轻，但必须从内心自觉的善行。在日本“耻的文化”中，“表白自己的过错反而招来耻笑，在耻的文化里会时时在意他人的评价，以他人的判断来订定自己的

① 参见杨月枝、刘焯：《从宫崎骏的动画片看日本人的自然观》，《电影评介》2007年第19期。

② 东山魁夷：《美的情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5页。

③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

行事准则”^①。

这种文化不利于个人创造力的发挥。中江兆民说“我们日本人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② 西周在《以洋文书写国字之我论》一文中也谈到，善于模仿是日本人不变的国民性，“日本人长于因袭、善于模仿，却拙于自我中心的才华表现”，也感慨这样的结果使得日本“到现在还不曾出现过独树一帜的个人”。^③

日本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同样缺乏独立自主的理念。明治以来，日本人常常存在着“和外国人比起来，日本人是……”这种强烈的比较意识^④，尤其担心在国际社会被孤立。“这种恐惧，不论是在外交政策上，还是在国民心理上，都表现为向某一大国的所谓‘一边倒’。在外交上，与最强的国家结盟，首先是与英国，30 年代末与法国，二战后很明显是与美国。‘一边倒’不仅是外交上的利益谋算，也是心情问题。”^⑤

（二）“日本人生存在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性的基准之中”^⑥

在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学者看来，哲学家的全副生命都应该奉献于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世界尽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法则。但在日本人看来，世界上不存在普遍性事物，宇宙间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原理和法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⑦ 也不愿意“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中国学者孙歌观察到：在有些场合，日本人也讲理，但“这种理不但不具备西方古典哲学超验的绝对理念的因素，而且也不具备中国宋明理学那种形而上的普遍之理的性质。它是一种对于个别、具体事态的判断，隐藏于其后的，恰恰是日本人强调瞬间价值的时间感觉，和与此相应的思维方式”。^⑧ 当代日本学者相良亨

① 南博：《日本人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71 页。

②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5 页。

③ 南博：《日本人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 页。

④ 参见南博：《日本人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 页。

⑤ 加藤周一：《日本文化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年，第 255 页。

⑥ 中村雄二郎：《日本文化的恶与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6 页。

⑦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 137 页。

⑧ 孙歌：《求错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74 页。

也指出：与中国人喜欢穷理，喜欢追究本源不同，在古代日本，“理”被理解为“道理”，它是不超越习惯层面的。“至少，道理不是超越时代与场所的普遍性规范，而且追求普遍性的姿态在此也得不到认可。”^①到了近代，日本思想家的基本方向依然是避免客观地穷理，而主张以情达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日本人缺少这样的普遍性的认识，在日本人看来，“如果没生过孩子，就无法理解父母的感受；不当父母的话，就体验不了父母的心情”。^②

东山魁夷对日本人思维的这一特性作出了如下解释“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富有哲理性的民族，这只不过是说日本并不像欧洲人那样通过理智或理性的深入思考、分析、整理，从而建立学术性的体系。而实际上，日本人一直在把握大自然的生命，直感地捕捉人的内心深层的东西。由于它的情感比重大于理智，倒是在艺术表现方面发出了光辉。仅仅一味地以理智来思考人类的生存世界，这是不合适的。这样，我就觉得日本人的情感之纤细，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③

受到这一哲学传统的引导，日本人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不为已有的理论、观念所束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自由展开行动的品格。用中江兆民话说，就是“我们日本人能够认清利害而不明白理义，爱好实行而不爱好思考”^④。日本的观念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相对缺少稳定性、一贯性和延续性，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性，亦可从这个角度获得部分解释。

对于日本人思想史存在的缺乏“共识”这一特点，丸山真男曾给出精辟的评论。在这位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史专家看来，“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标轴”，虽然“在各个时代里，也有过个别深邃的哲学思索，而且也不是没有那种往往被人们所肤浅地理解而实际上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但那些限定某个时代，或只截取某个学派或宗教系列进行的研究姑且不论，若要纵观日本史，把握思想的整体构造的发展，那么谁都将难

① 相良亨：《日本的理》，《文学》1988年9月号。转引自孙歌：《求错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2~273页。

② 多田道太郎：《身边的日本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③ 东山魁夷：《美的情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④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2页。

以着手。……若表达得露骨一些，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即那种可以给各个时代的观念和思想赋予相互关联性，使所有的思想立场在与其相关的关系中——即使是通过否定而形成的关系中——力图定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那种核心性的、或相当于坐标轴的思想传统”。^①

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蛙跳式”的特征。因积极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古代日本从石器时代直接进入到铁器时代。到了近代，又因善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一跃成为西方之外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二战后，仅仅用了 40 年的时间，又迅速成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日本人的语言表达就是：成为“耸立在亚洲这巨大垃圾堆里的唯一大厦”。^②

（三）在美学层面，日本人推崇和赞美“无常”

在日本人的哲学著述和连歌、俳谐等文艺作品之中，经常出现“无常”二字或相关内容。无常的信念，渗透于日本人的心灵深处。樱花作为日本国花，瞬间盛开却翩然凋谢，最能代表日本人的气质。“恰恰在无常与迅速中显现出瞬间生命光辉才正是日本的美。”因此，小泉八云说“在日本人的外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似乎都留着无常的特性。”^③西田正好则认为，《古今集》以后，日本人对于“物换星移、生灭枯荣”的无常观变得非常敏感。^④

根据小泉八云的观察，日本人的无常观起源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土地本身，就是无常的土地。河流时常变迁，海岸时常递嬗，而平原也时常起伏；火山的高峰，一会儿高，一会儿碎；石熔山崩，填满了幽谷，湖泊则忽隐忽现，甚至那举世无双的富士山，它那白雪皑皑的奇迹，为数世纪许多艺术家感兴趣的焦点，据说自从我到日本后，已经微微的变过样子了；至于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完全变过形态的山岭，更不在少数。”^⑤

木村敏则认为“日本式的风土寒温带兼具，四季分明，常有突发

①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4 页。

② 参见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97 页。

③ 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年，第 11 页。

④ 参见南博：《日本人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2 页。

⑤ 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

状况，季节变化影响日本人的生活，因此孕育出日本人热爱季节的美学意识。日本人从四季分明的变化中感受‘寂寥’，从‘飞花落叶’中体会无常。当日本人碰到具体的偶发状况时会马上做出因应之道，用肌肤感觉自然的变化，采取随机应变的态度，日本人最不会做的就是硬碰硬的对决态势。”^①

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日本人的无常意识，系受到来自中国佛教幻灭无常观的影响。佛教中的“无常”谓世间一切之法，生灭成坏，刹那不住。《涅槃经》说“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瀑水、幻炎。”《六祖坛经》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但日本人对“无常”的理解与中国人有所不同。中国人多在消极的意义上使用它，日本人则在消极中求积极，在变化无定中求创新。14世纪吉田兼好在其名作《徒然草》中明确主张“人世正因其变化无常才为可贵”，“时代变化才使各种事物富于情趣”。他甚至讥评“唯思常住”者是“不明变化之理”。^②

受到这种无常观念的引导，日本民族富有自我否定的精神和求新的欲望；在接受新事物时，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顾虑重重，程序繁琐，而是毅然决然，义无反顾。例如，同样作为早期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要早些，但中国的这一学习先进的尝试由于受到强大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而最终归于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却能够较为顺利地得以完成。

四 当前日本国民心理的变化趋势

一个民族的特性受其文化深层次因素的制约，具有高度稳定性。鉴于日本国民心理富于变化与调整，而实力对比的变化又构成这一变化与调整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根据日本面临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显著变化这一事实，做出这样的逻辑推理：日本国民心理正孕育一场新的历史性巨变，其基本方向是对美国的崇敬和依赖心理趋于淡化，对中国的

① 南博：《日本人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② 吉田兼好：《徒然草——一个日本法师的生活观》，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心理由歧视、厌恶和反感转变为友好和尊重。经由多年的发展，日本社会也在多元化方面取得初步进展，故日本国民心理正在酝酿的这场变化，或许不复往昔的变化那样迅速、全面和彻底，但变化本身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在二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人心理上对美国的崇敬和依赖，对亚洲邻国的优越感和歧视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日本国民对美国的好感，建立在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以及日本在安全和经济复兴两个方面都依靠美国这一基础之上。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美国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遭到质疑。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经济的走强，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美国对日本的重要性都有所降低。

中日之间由于地理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的原因，一直保持了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如今，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富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日本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习惯于变化的日本人就开始寻求在精神状态方面展现新的姿态，尤其 90 年代以来，经济状态的长期低迷，使日本人普遍感到压抑、郁闷和焦虑，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与日俱增，十分期盼着从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中摆脱出来。2009 年，日本政权发生更迭，二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为民主党所取代，正是这一人心思变的产物。

日本国民对华心理发生调整与变化，能够为日本带来新的机会与前景。在主观上，这一变化是日本民族的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在客观上则不失为日本有效增强其独立自主性，谋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好选择。明治维新后，日本一举成为亚洲强国，但民族主义出现恶性膨胀，自认为已跻身世界列强，不惜走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最终遭到彻底失败。上世纪 80 年代，“广场协议”使日元兑美元的比价上涨近一倍，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许多国民立刻感觉日本已是世界第一富国，石原慎太郎等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再次出现高涨，开始对美国

说“不”。但却缺少独立主导国际关系大局变化的能力，也无处借助一个与美国相匹配的国家平衡美国，最终以不了了之。现今，如果日本认可中国日益强大这一事实，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的看法，改善相互关系，增加相互信任，就会大幅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非常有利于自身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附、依赖和受支配的地位，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独立自主地位。

增加对华好感，有利于日本在经济上再一次走出低谷。近年来，“中国特需”和当年的“朝战特需”和“越战特需”一样，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了十年衰退的阴影。面向中国的出口，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中国更是未来日本经济的最大动力源泉和希望所在。如日本在经济复苏计划中提到的投资立国、观光立国和知识立国这三项战略，都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主要对象国、最主要的游客来源国以及知识产权的最大购买者。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刺激和推进文化提升的因素大部来自中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引进西方文化要素推动本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① 二战后，美国成为日本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来源国。但从 21 世纪开始，中国将再次成为日本文化和文明水准提高的重要动力源泉。日本和中国有着太多的历史渊源，因此，中华文明的振兴尤其能够给日本的发展带来刺激、动力和希望。中国的发展，将带来东亚文化的全面复兴。日本作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中的主要成员，不仅是这场文化复兴的参与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

“风起于青蘋之末。”实际上，今日日本的国民心理，已经显露出一些“正在孕育发生重大变化与调整”的迹象。

（一）日本政界和学界开始思考如何界定变化中的世界，尤其是如何重新定义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日本精英层逐渐在“摆脱美国，接近中国”方面达成共识，谋求形成日美中三角关系或平衡。“中国威胁论”的市场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中国机会论”。

^① 参见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第 23 页。

(二) 媒体态度有所改变

2009 年底,日本媒体评选出该年日中关系十大新闻,包括日本政权更迭后两国首脑频繁会面,日本对华出口超过对美,日本天皇破例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会见,日本向中国游客开放个人旅游签证,日中防长互访,两国在索马里海盗问题上合作,等等,所涉内容以正面居多。^①

(三) 大多数民众开始接受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逆转的事实,在心理上基本度过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安、焦虑甚至恐惧期,开始对中国另眼相看

日本内阁府 2009 年 12 月 12 日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有好感”的日本人达到 78.9%,比 2008 年上升 5.6 个百分点,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日本人比 2008 年增加了 14.8 个百分点,达到 38.5%。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同为 38.5%,比上年增加了 6.7 个百分点。^② 鸠山首相在 2009 年 10 月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说,众多日本国民都深切希望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③

(四) 新一轮的“中国热”初露端倪

在当今日本,中文的地位迅速上升,中国研究正在成为显学,书店里介绍和研究中国的著作在数量上大有超过关于美国和欧洲同类书籍之势,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纷纷把目光转向中国,赞美、赞扬中国的声音日益压过诋毁和批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正在出现新一轮的高涨。

日本国民心理正在发生的这一变化,表明日本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在心理上接受中国崛起这一现实的发达国家,这对中国周边国家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示范意义。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多受中国与日本关系状态的深刻制约和影响。如果日本与中国加深信任,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有利于消除周边其他国家对华戒心和防备,我国在未来发展中有可能来自周边国家的不利因素可能因此而大幅度减少。

(责任编辑:林 昶)

① 《共同网评 2009 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中评社北京 2009 年 12 月 28 日电。

② 《日中关系十大新闻透出民众好感度》,人民网日本频道 2010 年 1 月 15 日。

③ 参见《鸠山称众多日本国民希望中日关系越来越好》,《中国青年报》2009 年 10 月 10 日。